

接受 身份

广泛的共同身份可以成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而这种意识是良好政治的核心。

安德烈斯·贝拉斯科

什么是民粹主义？显然，经济学家仅从经济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定义。民粹主义的经典定义是“一种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不强调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外部约束以及经济主体对激进的非市场政策的反应的经济学方法”（Dornbusch and Edwards 1991）。

这个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并不适用于当今大多数被称作民粹主义的政权。即使是在完全符合多恩布什与爱德华兹（Dornbusch-Edwards）对于民粹主义定义的拉丁美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府中，也能找到同样的例子。玻利维亚前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至少在他执政早期，在管理国家的天然气收入方面是十分谨慎的；最近，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削减了开支，并且将预算赤字控制在了小额范围内。

政治民粹主义不同于经济民粹主义，它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只选择其中的一项。

民粹主义是一种以冲突为中心的政治方式（Müller 2016; Mudde and Rovira 2017）。一个被称作“人民”的同质群体往往与“精英”、当地少数民族、移民、外国人等其他群体相对立。穆勒（Müller）强调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的道德解释：

站在人民这边的人是道德的；其余的人都是不道德的，他们只听命于腐败的精英。

民粹主义的政治方法依赖于三点：否认复杂性、反多元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政治代表方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选择（建更多的学校还是医院？刺激还是抑制国际贸易？放开还是限制堕胎？）是复杂的，而对这些选择的反对意见是这种复杂性导致的自然结果。民粹主义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此，民粹主义者不可避免地不相信多元主义。在他们看来，只存在一种正确的观点，那就是人民的观点，所以，这是唯一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观点。因此，自由民主的复杂机制及其委托人与代表都是不必要的。没有必要进行无休止的议会辩论：一次投票就可以表达单一的“人民的意愿”。因此，民粹主义者喜欢全民公投，并往往会走上通往独裁主义或彻底专政的下坡路。

政治战胜经济

民粹主义高涨的背后是什么？标准答案是钱袋子。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收入分配恶化，收入处于前1%的人分到了最大的份额。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没有惠及的地方，人们丢掉了工作，

也失去了耐心。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还强化了华尔街是中产阶级的敌人的信念。难怪政治开始具有对抗性，而民粹主义者占据了上风。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政策结论就很简单：向富人征税，重新分配更多的收入，赶走那些听命于银行家的无赖。民粹主义最终会消亡。这种标准的表述很简单，也很吸引人。但它是正确的吗？它是政策响应的坚实基础吗？

不乏实证论文声称在北美和西欧，民粹主义背后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也有大量论文指出，民粹主义的高涨是文化反冲的结果。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和诺里斯 (Norris) (2016) 在研究了31个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之后表示，民粹主义源自文化反冲的证据不仅限于英国和美国。“总的来说，我们找到了最一致的证据来支持文化反冲论。”他们总结道。

迄今为止，大多数正式的证据都与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的可能来源有关。对新兴经济体中民粹主义形成原因的正式实证研究则少得多。但是，非正式证据表明，这与人们听说的有关富裕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

根据富裕国家的叙述，经济停滞以及落后者的挫败感占据了中心位置。相比之下，在新兴经济体中，右翼民粹主义在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与“经济不安全”假说的预测正好相反。自2010年以来，印度、菲律宾和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5%—7%。波兰几乎没有受到欧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是欧洲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92年以来，波兰的人均增长率超过了4%。

或者以其邻国捷克共和国为例，其失业率仅为2.3%，为欧盟最低。2017年，捷克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3%。捷克几乎没有移民，也没有什么难民危机。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政党依然在最近的选举中吸引了40%的选民——20年来增长了10倍。

因此，在这些国家，民粹主义似乎是经济利

益的产物，而不是痛苦的产物！另外，在标准叙述中，全球化的失败者应该成为民粹主义者，但是像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波兰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显然是全球化的赢家，可是它们也采取了民粹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棘手的事实需要考虑：如果高涨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对再分配的需求，支持这股浪潮的应该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然而，正如我们在巴西、匈牙利、美国和世界其他角落所看到的那样，右翼民粹主义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些民粹主义者提出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恶化，而不是改善收入分配，然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却在为他们欢呼。

政治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处理民众对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满。向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的转变表明，民主政治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不满。原因只有一个：身份问题。

身份的根源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最近著作《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中表示，“个人往往不希望自己的个性得到认可，而是希望别人认可自己与他人的同一性。”人们也希望这种身份得到认可和尊重。福山提醒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都把希望得到尊重的愿望视为人类的核心动机。因此，“身份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场为争取尊严而发生的斗争。”

民粹主义与此有何关系？关系很大。除了上述的定义之外，民粹主义还是一种为了获取政治利益而操纵和加剧身份分裂的政治风格。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它总是与“我们”而不是“他们”有关。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身份政治不是一个容易探讨的话题。直到最近，经济理论都没有为身份留下讨论的空间。人类应该拥有自己的偏

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它总是与“我们”而不是“他们”有关。

好，但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并不等同于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的连贯整体。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和雷切尔·克兰顿 (Rachel Kranton) 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点。他们认为，在广泛的背景下，偏好是由个人对社会身份的选择构成的。于是，这两位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这些偏好的经济意义。

阿克洛夫和克兰顿首创的身份认同方法有助于研究许多问题，但为了解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联系，有三点特别值得强调。首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人们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巩固自己的身份。例如，在美国高中 (Akerlof and Kranton 2002)，被认为是书呆子的学生会努力学习，而被认为是运动员或吸毒者的学生无论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取得好成绩，因为这种行为强化了他们的身份和自尊。同样，民粹主义政客采取极端且最终不可持续的政策向选民发出信号，表明他们 (政客) 不受权贵精英的摆布。因此，一旦考虑到身份因素，表面上看起来适得其反的经济行为就会显得相当理性。而民粹主义当然包含大量适得其反的经济政策选择。

其次，身份受制于不断增加的社会和政治回报。随着认同某一群体的人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要求认同该群体并遵守其行为准则的社会压力也会逐渐增加。或者说，人们可能会选择认同一个群体，一旦认同了这个群体，就会尽量缩小自己和这个群体之间的距离。

最后，如果身份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经济政策以外的武器就会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民粹主义政客往往会战略性地使用有毒和分裂性言论来“动员基层”，改变竞争身份群体的规模。民粹主义者不会因错误而令人讨厌；他们故意惹人讨厌。

如果说身份是民粹主义的根本，而民粹主义又是当代政治的核心，那么民主政治家和决策者应该如何应对？首先，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身

份的重要性，而且身份的副产品未必总是好的。

对身份的关注也促使人们更加关注长期以来被忽视或处理不当的问题。以城市的困境为例，去工业化已经摧毁了工作岗位。过去的标准建议是搬到一个有大量高薪工作的地方。今天，我们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建议。不仅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进取心的人离开了，留下的人们也难以维持业务和收支平衡。失业和向外移民的结合也削弱了当地社区，并对其共同身份构成了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是民主决策者的一个必要工具。

还有一些事情也必须改变：民主领袖必须学会实践身份政治，但必须是正确的身份政治。人类不能放弃自己狭隘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最为根深蒂固。但是，广泛的共同身份也很重要，它可以构成共同命运感的基础，而这正是良好政治的核心。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Michael Ignatieff) 在 2019 年 9 月 5 日出版的《金融时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身份是一场关于谁属于我们民族的持续较量。”替代这一鸿沟的唯一选择是共同身份，一种对国家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基于错误的种族优越感，而是基于我们的祖国代表着崇高的普世价值这一事实。FD

安德烈斯·贝拉斯科 (ANDRÉS VELASCO)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智利前财政部长。

参考文献：

- Akerlof, G., and R. Kranton. 2002. "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 (4): 1167–201.
- Dornbusch, R., and S. Edwards. 1991.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R. Dornbusch and S. Edwar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nglehart, R., and P. Norris. 2016.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Harvard Kennedy School, Cambridge, MA.
- Mudde, C., and C. Rovira. 2017.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üller, J.-W. 2016.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